

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 主办
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创新团队

China Studies Review International

海外中国学评论

主 编 朱政惠

副主编 王 东 姜 进

第
1
辑



上海古籍出版社

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 主办
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创新团队 主办

China Studies Review International

海外中国学评论

第 1 辑

主 编 朱政惠

副主编 王 东 姜 进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外中国学评论. 第1辑/朱政惠主编.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1
ISBN 7-5325-4240-8

I. 海... II. 朱... III. 国学-中国-文集
IV. Z126. 2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14051号

海外中国学评论(第1辑)

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 主办
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创新团队

朱政惠 主编 王东 姜进 副主编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

(1)网址: www.guji.com.cn

(2)E-mail: guji1@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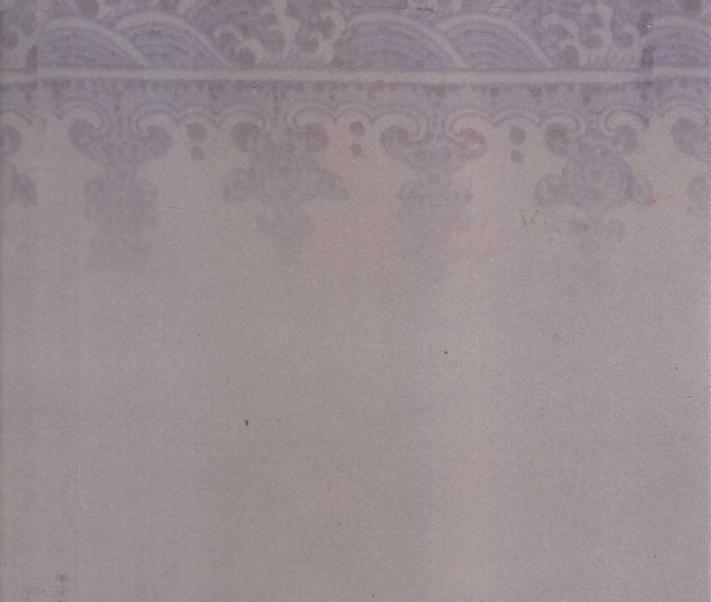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18 印张18 $\frac{12}{8}$ 插页2 字数363,000

2006年1月第1版 2006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册

ISBN 7-5325-4240-8
K·786 定价: 49.00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责任编辑 李志茗 装帧设计 何 旸

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顾问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元化 张芝联 张仲礼
张岱年 季羨林 章开沅

主 编：朱政惠

副主编：王 东 姜 进

编辑委员会(按姓氏笔画排列)：

丁 钢 于 沛 王 东 王家范 王晴佳(美国)
乔治忠 朱政惠 任大援 孙立新 邬国义 严佐之
严绍璁 杨国荣 李润和(韩国) 余伟民 忻 平
张西平 陆晓光 林同奇 林在勇 周振鹤 胡逢祥
施耐德(荷兰) 姜 进 费约翰(澳大利亚) 耿 昇
黄长著 曹景行 龚咏梅 阎纯德 阎国栋 虞和平
熊月之 戴晋新 魏丕信(法国)

写在前面

《海外中国学评论》第1辑即将出版,为了这一集刊的面世,我们已经努力了多年。

集刊由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和海外中国学研究创新团队主办。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于1996年3月创办、海外中国学研究创新团队于2004年3月成立,目的就是要促进海外中国学的研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加强了。无论在机构建设、资料搜集、人才培养、学术成果方面,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只要亲眼目睹他们那些学术研究,就会深切地感受到:作为他们研究对象国的学者和学术界,没有感觉、没有学术反馈、没有深入的反研究是说不过去的。

外国人研究中国,有相当部分成果有明显的现实目的,希望详实了解中国的现实政治和经济,给予本国政府决策部门重要的咨询参考。当然,更多的研究属于学术研究,是为了了解和探讨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研究和分析中国的传统及其现代走向。这些都决定了我们对他们的反研究所内含的重大现实意义和学术意义,所以政府部门和学术机构都会重视这样的反研究工作。海外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与汉学家们的思想、观点和方法,由于视角、立场和母体语境的关系,往往和我们所看的问题不一样,方法和结论也有差异,这正好成为我们研究的参照和借鉴。中国人最知道自己的心脉所系,但有时候很难知道自己背上的包袱,海外中国学研究能解决很多这方面的困惑。

海外中国学的研究热潮正在国内悄然兴起,它的发展越来越需要学术研究成果的展示平台。《海外中国学评论》正是这样应运而生的。我们希望把它办成反映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前沿学术阵地。

这个集刊有介绍和研究前沿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和汉学家们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成

果的文章,有介绍和研究各国中国学前沿状况及其学术思潮的文章,有海外中国学研究档案的介绍和评析文章,有中国图书馆、档案馆收藏的海外中国学研究档案及其资料情况的文章,也包括我们对海外中国学研究学科建设的探讨及其工作进程的反思文章等。我们希望通过各种不同的陈述方式如演讲录、访谈录、专题理论文章等,深入对这些问题的探讨。

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海外中国学研究创新团队成立以后,得到了季羨林、张岱年、王元化、张仲礼、章开沅、张芝联等国内学术界前辈的关心和支持,得到了柯文(美国)、巴斯蒂(法国)、何炳棣(美国)、魏斐德(美国)、裴宜理(美国)、麦大维(英国)、滨下武志(日本)等海外著名中国学家的关照和帮助。学校的主要领导张济顺、王建磐教授,以及前任领导都给予了重要支持和资助。多年来,历史系的领导也一直关怀和指导中心、团队的发展。没有这些可贵的支持和帮助,不会有中心、团队的今天。我们对所有支持和帮助过我们的海内外学术界朋友及领导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和谢忱。

《海外中国学评论》创刊了,如同刚刚破土而出的小苗,还相当稚嫩。我们一定会精心浇灌它,让它健康成长起来,也期待学术界的同仁共同来关爱它。

衷心希望《海外中国学评论》能成为沟通海内外中国学研究的桥梁和纽带,为中外学术交流、为促进国内的海外中国学研究做一份有益的贡献。

编者

2005年10月12日

稿 约

《海外中国学评论》(*China Studies Review International*)是由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海外中国学研究创新团队主办的学术研究集刊,每年下半年出版。

本集刊主要刊载有关海外中国学家、海外中国学名著、海外中国学研究思潮、海外中国学发展史、海外中国学档案、海外中国学文献、海外中国学研究学科建设的论文、译文及书评等。

我们谨向国内外的学术界朋友约稿。来稿须反映本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篇幅控制在 6000 至 15000 字左右。文章提要控制在 500 字。题目和文章提要需要翻译成英文。所有来稿,均请誊写清楚,最好以电脑软盘或使用电子信箱投稿(纯文本文件或 Word 文件)。

为阅读方便,本刊注释采用页末注形式。

本刊编委会尊重作者观点,但有权进行技术处理。凡不愿修改者,请事先声明。5 个月后未收到录用通知者,可自行处理其稿件。

地址:上海中山北路 3663 号 文科大楼 8 楼

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

邮编:200062

E-mail: ECNU - chinastudies@ yahoo. com. cn

《海外中国学评论》编辑委员会

2005 年 10 月 12 日

目 录

● 演讲录

- 论华人出国史研究 [美]孔飞力著 龚咏梅译 1
- 明清时代的性别、医学与身体
- 中国研究中女性主义历史写作的历程 ... [美]费侠莉著 姜 进译 11
- 历史学家如何超越民族史、国别史 [德]尤尔根·科卡著 齐克彬等译 20
- 海外上海学研究透视 熊月之 33

● 访谈录

- 忆老友本·史华慈教授
- 希·普特南教授访谈录 林同奇 43
- 女性主义视野中的中国历史
- 与费侠莉教授的对话 姜 进 63

● 中国学学科建设讨论

- 论海外中国学研究
- “传教士与美国早期中国学”研讨会发言摘要 余伟民等 71
- 改革开放以来海外中国学研究析略 吴原元 85
- 汉学(中国学)研究导论 张西平 97

● 各国中国学研究

- 早期美国来华传教士与汉学研究 仇华飞 109

美国中国学的职业化进程问题	朱政惠	124
传教士与远征军		
——法国传教士艾嘉略第二次鸦片战争亲历记	耿昇	136
19世纪德语文献中的中国游记	王维江	154
澳大利亚中国学的发展及其特点	胡再德	165
 ● 各国中国学研究译介		
加拿大的当代中国研究	[加拿大]格雷汉姆·约翰逊著 李江涛译	187
中国研究在越南再度出现	[美]马克·塞德尔著 马少甫译	200
 ● 海外中国文献研究		
《四库总目》、《续目》未收清人经籍的经学史意义探微		
——以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本为例	严佐之	214
 ● 海外中国文学研究		
洛蒂《北京的末日》中的中国形象		
——从作品中一人物形象谈起	王恬	231
 ● 海外中国学档案资料选编		
关于史华慈的两份重要档案文件		242
 ● 国内海外中国学文献研究		
徐家汇藏书楼有关清代历史英文珍本书目述要	马少甫	253
徐家汇藏书楼馆藏早期美国传教士中国研究书目述要 ...	王仁芳 蒋如俊	260
 ● 国内中国学研究概况		
“1949年前中国学术界对美国汉学的译介”篇目初编		271
国内中国学研究纪事(1975—2004)		286

● 书评

客家移民史研究的新范式

——评《中国历史上的移民与族群性》…………… 王 东 295

卡夫卡对古代中国的想象

——读《中国长城建造时》…………… 彭 振 陆晓光 308

● 其他

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与海外中国学研究创新团队概况…………… 314

“传教士与美国早期中国学”学术研讨会综述…………… 317

后记…………… 323

论华人出国史研究*

[美]孔飞力著 龚咏梅译

当称颂刘广京教授时,我就加入了他的许多过去学生的行列,学生们回忆起他作为行家的领导,这正如我们哈佛人所了解的如何进入费正清的中国研究帝国一样。1958年,我第一次认识广京先生的时候,他正在协助费正清开设现代中国史的导论课。广京先生身体力行来进行教学:完整地使用原始资料,决不自命不凡地写作,不遗余力地鼓励学生。稍后,作为广京先生的一门暑期课程的助教,我有幸目睹一位杰出的学者型老师是如何工作的,而从那以后到现在,我一直非常努力地仿效他。刘老师,非常感谢您!

今天,我将会抓住一个棘手的大主题来谈,即华人在现代向一个更广阔世界的移民。这个课题有时被表述为“中国的海外扩张(China's expansion overseas)”,这听起来带有些威胁的意味。但实际上,这个课题与任何中国政府无关,无论是帝国政府还是民族国家的政府。移民,如王赓武所指出的,一开始是充当“没有帝国的商人(merchants without empires)”(这些商人,包括所有在东南亚建造殖民主义者城市的熟练工匠)。虽然没有他们自己的帝国,那些商人的确曾经拥有所谓的“借来的帝国”——欧洲殖民者的帝国,在那里,他们从事贸易,并且通过与欧洲殖民主义者的密切合作,让中国向世界开放,同时也让世界向中国开放。

我的题目暗示着中国现代史与华人出国史之间,存在着一种深层的相互关联。

* 本文是根据哈佛大学东亚系主任孔飞力(Philip Kuhn)教授2004年11月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刘广京讲座上的演讲稿翻译的,经孔飞力教授亲自审定。译者龚咏梅现为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为了在有限的时间里证明这一观点,让我提出三条简单的看法。

(1) 华人现代出国史和中国现代史,实际上是同一社会历史进程的两个方面;

(2) 我们所称的“移民社会”,是一个双边的有机体,它的一面在接受移民的社会中,另一面内含在输出移民的社会里。这两方面被一条“走廊”连接起来——这条走廊是一个文化的空间,双向地传输着人员、金钱和信息;

(3) 海外华人曾经是,而且仍然在参与一个持续了5个世纪的建立“边疆侨地(frontier enclaves^①)”的进程,在这些地方有特殊的规则,允许中国的和外国的贸易得以不受妨碍地发展,免受大清帝国及其后继的中国民族国家的官僚机构和意识形态的干扰。

让我从背景历史开始谈起。

华人现代出国史包括四个时代(如所有好的历史分期方案一样,这个分期也具有模糊性和重叠的边界):早期殖民时代(16世纪—18世纪);大规模移民时代(19世纪20年代——1930年);亚洲革命时代(19世纪30年代——20世纪30年代);全球一体化时代(20世纪40年代以后)。

中国的“现代”出国移民,在16世纪早期,欧洲人到达东南亚时就开始出现了。那些欧洲人无论在哪里建立他们的贸易总部,总是会发现小型的华商群体:葡萄牙人在马六甲(1511),西班牙人在马尼拉(1570),荷兰人在巴达维亚(今为雅加达,1619)。在欧洲人的庇护下,华商挤走了其他国家的竞争对手,成为殖民地的占支配地位的中间人群体。相似的过程在大陆东南亚地区也发生了(直到19世纪中期这一地区还保持着未被殖民的状态),例如,在暹罗,大约18世纪晚期,华人已经成为那里王室财政管理的重要因素(王室自身有部分的中国血统)。

在中国方面,当明朝废除了对私营海上贸易的禁令(1567),为更大数量的商人侨居海外开辟道路后,它的现代时期就可以说是开始了——虽然移民本身还是非法的。在这个转折点上起关键作用的是“海上贸易派(maritime lobby)”,我将在稍后更多地谈这个问题。

在早期殖民时期,华人充当了欧洲人所需要的许多角色,包括扮演对华贸易的中间人、殖民制度的税款包收人(即收税人),以及充当欧洲人与土著居民贸易的中间

① “frontier enclaves”是孔飞力先生发明的一个新词汇,指的是像在海外的唐人街那种处在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包围之中,而保持着中国文化特色、保持着与中国联系的特殊区域。

人角色。他们对中国的巨大贡献之一,就是经由马尼拉把白银从新世界输送到中国。在马尼拉,西班牙的大型帆船从墨西哥南部的港口城市阿卡普尔科运来了大量的白银,以支付购买中国丝绸和瓷器的货款。从马尼拉出发,中国帆船将白银运到中国东南地区,白银在这些地区扮演了中国商业化进程中决定性的角色。一段时间,中国帆船也在爪哇和中国之间继续开展与荷兰人的贸易,在这个过程中运送了大量移民。

正如施坚雅(G. W. Skinner)所证明的那样,航海时代的移民进程足够缓慢,能够允许一个稳定的、被部分同化的华人社会的出现,由于移民与当地马来妇女通婚,其结果就是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这些移民的后代虽然(基本上)没有保留中国的语言,但保留了中国文化的某些方面。

大规模移民时代开始于拿破仑一世战争时期及其后,伴随着英国人大举进入东南亚和东亚地区。在鸦片战争后的“条约体系”之下,西方势力被强加于中国港口城市,它事实上允许不加限制地招募移民,经常以暴力或欺骗的方式,将移民贩运到世界各地劳工短缺的种植园和采矿场。这也是北美洲和澳大拉西亚(Australasia,泛指大洋洲和太平洋岛屿)掀起淘金热的时期,而且是中国移民自愿迁徙到那些地区的开端。这种新的移民动向形成了一个移民路线,这是向新地点进发的历史性转移。随着移民在1860至1893年间的合法化,主动和非主动移民的速度都加快了;移民的性别比大约在1900年之后开始正常化。这是声名狼藉的“苦力贸易”时期,而且也是无耻地攫取廉价的亚洲劳动力的时期,中国人也包括殖民地的印度人和爪哇人,遭到残酷剥削。由于蒸汽运输工具将大批华人运送到那些老的侨民聚居地,新的、更亲华的和文化意义上的华人,就在更早到来的、已经适应当地文化的华侨团体旁边定居下来。有了这两条更快捷、更安全的途径,移民与他们的故国中国之间的纽带变得更加有力、更具政治性。

我所谓的“亚洲革命”,是指殖民地人民抵抗殖民的和帝国主义统治的时代,日本作为地区霸权的出现,以及从东亚和东南亚驱逐(在日本人的帮助下)西方人的统治。海外华人于是发现他们自身在由殖民地原住民所统治的“新国家”里成了少数民族:这些原住民包括马来西亚人、印度尼西亚人、菲律宾人和越南人。华人少数民族裔,突然被剥夺了他们的殖民地庇护人,他们不得不应付新的、针对他们的政治身份和经济策略而来的紧迫挑战。到这个时期结束时,向东南亚地区的移民已经停顿下来,一个新的国家政权出现在中国大陆,并且台湾地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政治竞争,加深了移民社会中的分野。华人少数民族裔很快发现他们成了殖民主义者的替

罪羊,他们遭到那些正努力构建其民族认同的殖民地时期之后的多数民族的压迫。

全球一体化的时代(身处于这个时代中间,我们缺乏一个足以分析这个时代的历史术语)已经使中国移民的模式产生了较大的变化。由于东南亚不再是移民的一个选择,并且由于北美洲和澳大利亚成为后起的更为接纳亚洲移民的地区,移民潮发生了引人注目的转变。在这些地区,“排华”和“白人专用”的立法被废止,对华人移民施行了更加慷慨的移民条款。欧洲也开始吸引新的移民潮,其中包括很多从前殖民地迁来的再次移民者。廉价的空中交通和电子通讯,连同毛泽东时代以后中国的开放,允许了移民与祖国之间有更加自由的相互往来。最后,华人移民的阶级成分和地区来源已经急剧地发生了转变。

从这个有关移民史的提要性介绍出发,让我继续讨论前面提出的三个方面。

(1) 华人现代出国史和中国现代史实际上是同一社会历史过程的两个方面。17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开始了对外移民,虽然只是一个相当小的部分,却是一个更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进程的重要部分,通过这个更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进程,中国家庭在人口迅速增长的时期,寻找各种新的途径谋生。简言之,人们找到的答案是多样化和移民。土地匮乏的农村家庭的生存策略,一开始是在市场上出售货物,包括家庭手工业制品和经济作物。另外一种能够出卖的“货物”,就是人的劳动力(通常是男性)向家乡以外输出,这符合在尽可能广泛的资源基础上从事与生存有关活动的生态学原则。在这个过程中,似乎并不是以整个家庭成员都外出的方式迁徙的。更恰当地说,是男性劳动力的输出,他们或者在邻近的农庄、在附近的镇上,或者是到更远的地方,离家工作;他们或者是充当体力劳动者、走家串户的小贩、长途运输商贩,或者是充当客商。

我的假设是,通过空间扩展(这是一个与将核心家庭的空间单位理想化的与当代社会相当不同的概念),中国人的家庭作为一个经济和礼仪的单位并不是被削弱了,反而被加强了。季节性或长期地离家在外工作,意味着要汇款回去养活家庭,而家庭是旅居者在其中保持他的经济和礼仪位置的一种实体。虽然在毛泽东时期停止了大约20年,今天这种谋生策略以一种极快的速度持续着,估计中国国内移民已经达到了1亿人以上。

对于移民来说,中国家庭曾经是他们的中枢组织。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家庭生活在一个“空间连续统一体”和一个“时间连续统一体”中。“空间连续统一体”的意思是“共同生活”,并不一定意味着生活在同一个物理空间里。“归属于”某个家庭,并

不只是因为一个人居住在100里、1000里,甚至是1万里之外,就得与它妥协(情感上或经济上)。相反,“分居”也许意味着人们虽然居住在同一个大院里,却分灶吃饭。“时间连续统一体”则通过祭祀礼仪和职业,把一个男性和他漫长的父系谱系联系在一起。祭祀仪式(“祖先崇拜”)既维系了他与先辈之间(祭拜祖先灵位牌)的向上联系,也维系了他与后嗣们(他们向他的灵位牌表示可能存有的敬意)之间的向下联系。职业铸造了代际之间的经济联系,每一代都为现在的和未来的家庭成员提供现存的、保留过去的、或扩展现成的生产资料。

这两种连续统一体很难说是中国家庭所独有的,但是中国人的情况似乎特别显著,而且尤其适应于迁移,两种统一体为侨居异乡提供了物质和心理的基本原则,鼓励了一种长期以来存在的生活底线。这条底线证明,为了未来做出自我牺牲是正当的,而这种自我牺牲是大多数第一代移民都必须忍受的。也许不仅是因为具备这些特性才使移民成为可能,而且这些特性还依次规定和塑造了家庭文化,以满足移民这种至关重大的生存策略的需要。

移民也牵涉到迁移整个家庭:实际上几百万个家庭曾经迁移到了人口不太拥挤的多山丘陵地带、东北平原、四川盆地、广西河谷地带。但是家庭移民通常是最后的解决办法;移民的首选进入点仍然是男性劳动力的输出,同时尽可能地保持在家乡的家族根基。对于一个相对于可耕地男性过剩的家庭来说,劳动力就是一种最适宜出售的资源。旅居者寄回家的汇款所增加的经济利润,对于一个家庭的生存来说是决定性的。而且从17世纪开始,对于东南沿海的家庭来说,东南亚的殖民地和台湾岛日益成为最易到达和最希望的劳工输出地。甚至可以认为“南洋”和台湾就是中国东南部和岭南地区的延伸,因为那时,最廉价的交通路线已经横跨大洋。

把对外移民视为帝国晚期国内移民的一个相当小的部分,使我们得以去研究国内环境和国外环境下人口迁徙的共同机制。这些机制包括如下的移民机构,例如,类似于行会的“会馆”,它为侨民们提供了远离家乡的文化中心,在移民社会的输出和接收的两方之间保持走廊畅通,而且还提供一些基本的服务,如建造同胞墓地,将遗体运回遥远的家乡。庙宇和地域性神灵的神寺,由于它们的香火是移民从家乡的寺庙虔诚地奉迎而来的,这些庙宇和神寺被神圣化,满足了生活在遥远侨居地上移民们的精神需求。这些精心建立的移民机构的海外变种,为比较研究提供了无穷无尽的案例。

一旦我们建立了这种观念,可以认为,无论是向内还是向外的移民,都是帝国晚